2009 年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田野題目：
國家/移民工劃界政治：印尼勞動移工在馬來西亞多族裔穆斯林社會的身份認同

計劃單位/人員：張溦紟

目 錄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2
一、問題意識 3
二、田野執行 4
三、田野現象觀察和訪談初步報告 5
4.1 沙巴 5
山打根：族裔化的城市中心 5
洗衣工廠的菲律賓籍女工 5
木屋區的印尼移民 7
山打根中型油棕園的印尼有證移工 8
斗湖的「芭」 11
斗湖：日常生活中頻密的界線穿越 12
斗湖的田野執行局限 13
4‧2 吉隆坡、雪蘭莪 13
舊報章資料收穫 14
吉隆坡的無證移工與合法奴工 15
五、成果自評 17
參考文獻 19
附件：照片 20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本田野研究計劃期待能夠從微觀層次的遷移主體，檢視國家這套劃界政治如何影響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和遷移認知及經驗，甚至對國家霸權提供挑戰的可能，抑或遷移主體在現代民族國家所掌握的合法暴力下，其身上原本看似擁有同文同種的文化身份優勢，卻僅能被鑲嵌在階級、國籍、族群等多重壓迫支配關係之中。

本田野執行地點以東馬沙巴的山打根和斗湖，以及西馬的吉隆坡和雪蘭莪爲主。東西馬兩地所引入的移工類型，不管是居留身份，或是國籍和工作類型，都有所不同。因此，同時觀察兩地有助於我們對兩種不同類型的移民系統，以及在不同系統影響下的遷移主體形構有更多元的了解。此田野報告將簡單地摘要這次田野進行的觀察和訪談收穫，以及在此過程中所蹤到的困難和局限。

關鍵詞： 劃界政治， 國際遷移，移民/工

The aim of the field study is to explore Indonesian workers migration in Malaysia,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way and the extent of the politics of boundary making of the state . The boundary works might influence the migrants' self-identification and their migration conception or experience . To focus on the micro level of migration would show us the potential of challenging the hegemony of the state. Or, the migrant subject being emerged into strata, nationality ,ethnic and etc the relations of multi suppressive and domination under the legitimate violence of modern nation-state.

The destination of the field-study was specifically conducted in both Sandakan and Tawau of Sabah , and also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of Peninsular Malaysia. Studying both East side and Peninsular of Malaysia could assist us to get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migration system and certainly the construction of migration subjectivity in these two different places. The report covers the brief of the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findings of field study, including the limitation and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study.

Keywords: politics of boundary-mak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mmigrants

一、問題意識

本田野研究計劃期待能夠從微觀層次的遷移主體，檢視國家這套劃界政治如何影響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和遷移認知及經驗，甚至對國家霸權提供挑戰的可能，抑或遷移主體在現代民族國家所掌握的合法暴力下，其身上原本看似擁有同文同種的文化身份優勢，卻僅能被鑲嵌在階級、國籍、族群等多重壓迫支配關係之中。

就微觀的遷移主體而言，本研究欲專門討論馬來西亞移工遷移集中地區雪蘭莪、吉隆坡和沙巴三地的印尼移工，檢視這些遷移主體的劃界工作如何進行。這些移工早在國家有意規制化跨國勞工以前就已有頻密的流動痕跡，而且一直是馬來西亞外籍勞工的重要來源國(不管是有證或無證的)，更重要的是與馬來優勢族群具有文化和宗教上的親近性。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理解身處在族裔身份如此相近的異鄉裏，他們是如何辨認並再度確認自我身份？他們如何受到了國家這套劃界工作的影響，進而範限了他們對自身的認知和行動的可能，甚或對國家既有的劃界政治提出挑戰，加以檢證和對比地主國和底層移工詮釋和認知的異同。例如，不同國籍或文化身份的移工如何詮釋他們遷移到馬來西亞的動機和經驗？他們如何區分自身和地主國的不同族群，而這個劃界本身是否及如何可能撼動了國家既有的分類框架進而對國族建構政治提出挑戰，抑或延續並強化了佔主導性的地主國劃界框架？

馬來西亞的跨國勞動遷移的形成和經驗，與一般種族均質化國家如香港、臺灣、日本等地不同，後者一旦納入全球化後代來的經濟勞動移民/工，因爲種族、膚色、語言、文化的差異，而比較容易被國家、社會和媒體操作為顯著的他者，除了臺灣對於大陸配偶和移工的曖昧態度，凸現了在特定時候國族主義的篩選原則淩駕於其他因素之上。馬來西亞原有的多種族成員是殖民經驗的結果。獨立至今，國家內部各族裔之間的整合過程一直遭遇到很多挫折。以馬來精英爲主來領導的國家政府，在法規和政策制定上以消除貧窮爲由，明顯地保護和鞏固馬來族裔在政治和社會資源上的利益。在此情況下，其他少數族裔如華裔和印度裔，長期制度性地被排除在外，淪爲二等公民，擁有較多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者，更在 90 年代期間逐漸移出國外，各族裔之間的緊張關係尤其可見。同時，國家政府精英和經濟精英跨族裔的合作，加上經濟發展和福利資源分配不均等，更是在跨族裔之間造成了階級的差異。

在此脈絡下，大量低階勞動移工的引入，同時引起了弱勢少數族裔的焦慮。這些以印尼和菲律賓爲主的移工，與馬來優勢族群擁有高度文化和宗教的親近性，曾經共享為馬來群島疆域，甚至他們共同擁有的南島語族身份至今仍然深遠地影響著他們的遷移軌跡。就政治層面而言，國家「引入」「同文同種」的印尼移工或穆斯林菲律賓移工，被認爲是鞏固和強化馬來族裔優勢地位的手段，進而其他少數族群造成威脅[1] (Chin 2003)。然而，我們要如何理解國家自八零年代以降，試圖透過移

[1]尤其在沙巴一帶，州政府爲了增加馬來或土著族裔人口，而允許菲律賓和印尼難民以政治庇護的因素入境，並頒發身份證給該政治難民，成爲具有投票權的政治選民，以鞏固州政府和國家的執政優勢。問題在於這項政策會隨著州政府或負責單位的更替，而不斷改變政策。所以，來自菲律賓和

工政策將所有國籍移工他者化的傾向？一般國際遷移認爲移民/工爲他者(Others)，將會對國族統一、和諧造成威脅，因而接收國普遍將這些外來者他者化，視爲非我族類的他者，將其排除在公民身份、社會和政治權利之外。

關於將勞動移工他者化的討論，Dannecker(2005)認爲 80 年代以來，隨著大馬現代化發展而引入的移工，經歷政府政策和媒體論述的他者化過程，有助於國家在特定層次上打造國族統一(national unity)，使馬來西亞國族打造被重新界定，或再結構。作者認爲，進入現代化進程，原本延續英殖民歷史傳統分化、對立的各族裔，因大量移工的出現以及社會和經濟的變遷，而漸漸從固封的族裔民族主義漸漸轉向能夠融合各族裔差異(卻將移工，包括文化親近的印尼移工排除在外)的國族民族主義。儘管，作者也有提到在真實社會中，此一國族統一又是馬來族裔的利益作爲優先，因而國家的族群內部仍然是分化，文化、經濟和社會上各自獨立的。

但是，本研究欲提出不一樣的看法，馬來西亞國家菁英試圖建立一個以馬來優勢族群爲主、「理想的現代化、世俗化穆斯林國家」的過程中，將這些曾經同時泛馬來族裔或南島語族的移工他者化，其所建立的國族建構圖像並非只是 (終於)能夠融合各族裔和諧相處的一個「馬來西亞」而已。相反，這個「理想的現代化、世俗化穆斯林國家」其實也再度鞏固和強化了原來以優勢種族為標地的國族想象，可能再度鞏固和強化了馬來性(Malayness)在國內各種族裔的優越性，成爲各弱勢原住民必須遵循的土著(bumiputera, son of soil)最佳範本；同時也在東南亞中區辨了馬來人在泛馬來族裔或南島語族群體之間的差異性，進而建構並強化了一個「馬來人的馬來西亞」。

二、田野執行

這次的田野報告特別難下筆，後來發現主要原因是自己一直急於想將這兩個月多來的田野，所經歷的、訪談的、感受的「完整」地呈現出來。按照這個階段的，應該承認和接受目前的田野經驗仍然是破碎、不連續的，並且先將這些經驗暫且「零散」地記下。待沉澱以後，才慢慢反復思索與理論之間的對話。

儘管沙巴僅是本論文研究的參照點，討論移工作爲主體的遷移經驗和認同形構，仍然以西馬半島的雪蘭莪和吉隆坡爲主；但是，這次在東馬沙巴的田野收穫獲益匪淺，大大地彌補了我一向對於東馬的遷移形態，在經驗上的認識不足。當然，此次田野進行所蹤到的困難同時發生在東西馬，主要原因來自於可參與在田野的時間有限，以至於與訪談對象的談話往往非常有限，而無法能夠順利地跟訪談對象建立和維持相對平等和穩定的關係。
以下田野報告，將分別整理出東西馬的田野收穫，以及各自所面臨的困難。

印尼的難民儘管可能透過各種變更的管道抵達沙巴，但因不一緻性的政策，先後抵達的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員，往往具有不同的身份。此外，國家並非施以相關的配套措施，例如如何整合到教育、經濟機制之中，而變得問題重重。

三、田野現象觀察和訪談初步報告

4.1 沙巴

爲期十天的沙巴田野(2009/10/13-23)，先是到了以菲律賓籍移民/工爲主要聚集地的山打根，之後乘搭在地的四輪驅動車前往印尼移民/工爲主的斗湖。除了按照原定計劃前往這兩個田野地以外，後來在報導人的協助與安排下，進入較大規模的油棕園。油棕園的工作，在沙巴一帶具有族裔的特色，油棕園裏的工作大部分由印尼人所擔任。此外，也在結束斗湖田野之後，開車前往 Semporna，一個以菲律賓巴瑤族裔為主要聚集地的靠海地區。

山打根：族裔化的城市中心

原本以華裔爲主要人口的山打根，目前為移民/工休閒與工作的集中點，這些移民/工多來自菲律賓，少數來自印尼。山打根市中心的大型菜市場與碼頭相鄰，加上這裡亦是各種水陸交通的重要樞紐，因此更容易遇見貨物、人力的流動和穿越。

從原本是由華裔經營洋貨、餐館、布料、金飾爲主的店面，在這數十年間也都經歷了變化。華裔商人逐漸地從市中心移出，轉移到鄰近的郊區發展，華裔消費群體進出市中心的機會也減少了。儘管有些店面仍然由華裔經營管理，像大賣場、餐館、手機通訊店，但整個市中心的商業形態和對象開始族裔化，市中心的經濟脈搏主要由移民/工支撐住。

鄰近的市立菜市場，三樓主要是由華裔經營的飲食攤販，二樓專門販售從菲律賓進口的日常用品，其中以護膚品為多。靠近碼頭的山打根市中心，出現兩極化的發展，一側是以移民/工為主要消費對象的老舊式客運總站、市立菜市場，另一端卻是正在興建中的大型購物廣場(shopping mall)，一年半前才開始動工，與其毗鄰的還有四星級飯店。那被命名為 Habour Square 的碼頭，晚上都是外國遊客在戶外溜達。

洗衣工廠的菲律賓籍女工

山打根的訪談分別在洗衣廠、餐廳、難民村等地進行。個別訪談時間皆在 20 分鐘到 1 小時間之間。由於身處山打根的時間有限，這些訪談對象，大部分都是透過報導人的引介下，才得以順利進行。不過，負責引介的報導人通常跟該地有特定的聯係關係，例如雇主或雇主的朋友，因此這樣的訪談很可能出現受訪對象礙於雇傭關係或類似的利害關係，以至於我和受訪對象無法建立穩定的信任關係，而使到受訪對象對一些問題有所迴避。在訪談進行過程中，我所蹤到的雇主通常都會有意

識的主動離開現場，能夠與訪談對象進行一對一的交談。不過，雇主在訪談現場的缺席與否，並無法真正避免訪談者與受訪者的權力不對等關係。

專門替醫院、餐廳和飯店提供烘洗服務的洗衣廠，一共聘僱了近四十位女工，採輪班制分作早晚班。這是一家類似於貨櫃箱蓋成的中型工廠，裏面有大型的洗衣機、消毒蒸汽機、烘乾機、燙熨和折疊衣服的地方。山打根地理位置因靠近菲律賓的關係，這裡所聚集的移民/工都以菲律賓籍爲主。我在洗衣廠所訪問到的女工，都是來自菲律賓的。不同的是，她們有的是在沙巴出生的，有的則是小時候跟著菲律賓籍的父母親或親戚一起遷移過來。

她們都沒有證件，沒有工作證、也沒有相關的居留身份證，年齡介於 15 到 28 歲左右。我蹤到的這幾個女工，都是最近幾個月才開始在洗衣廠工作的。她們有的之前都在從事「kontrak」[2]的工作，在建筑工地裏從事搬運石子、磚頭等工作。但因爲工作時間不穩定，且薪資很低。所以，對她們而言，洗衣廠的工作雖然也需要大量的體力，但是相對於她們之前的工作，洗衣廠的薪資比較高，一個月可以領三百塊馬幣(約兩千多到三千塊台幣)而且可以和一群人一起邊工作邊聊天，比較開心。

雇主和員工徵聘員工的方式，高度依賴非正式網絡。我所接觸的洗衣廠女工，都是從朋友那裏得知工作訊息。她們都說工廠離開家不遠，走路上班，但是路程可能要花上三十分鐘。下班後通常都不會去那裏閒逛，因爲還得趕著回家幫忙處理家務。這些女工出外工作的原因，主要是需要多一份工資來維持家裏的經濟。米、油很貴，是常聽她們對在地物價的抱怨和不適。家裏的弟妹還小、需要供弟妹上學、父母親年老，是常見的原因。

在這個國度裏，她們及她們的家人，不管是在居留或工作身份上，都是沒有證件的。從父母輩那一代一直到她們，少說也已經呆在這裡二、三十年或以上。她們再也沒回去家鄉了，「那裏都沒有我們的親人」或「我們的朋友都在這裡了」，是最常見的說法。有的女工其實就從小在這裡出生、成長，從來沒有去過「家鄉」(菲律賓)。她們每個家庭都曾經、正在嘗試將自己的居留身份合法化。我在那裏蹤到一個女工，是我那天下午蹤到的洗衣女工中，較敢對我這陌生人說較多抱怨的。儘管她會再次向我確認這樣的訪談是做什麼用的。她說，她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不斷的付錢給中介，希望能夠幫忙她們，將其身份合法化。但是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成功，「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錢了」。

在地人民或媒體經常對於這些移民/工(他們當中有的是難民)抱著敵對的態度，認爲他們搶奪了當地的資源。在他們的印象中，這些外來移民總是能夠輕易地取得

[2]英譯是「contract」，一開始我以爲是泛指一切與短期契約相關的工作。由於我在沙巴的田野，尤其是蹤到菲律賓籍移民/工，雖然我跟他們都能用馬來語進行溝通，但是我不太能夠適應她們的口音，所以有些對話會蹤到困難，需要經過反復詢問確認。或依循談話的脈絡才能加以理解。聽到「kontrak」時，正是蹤到這樣的困境。後來才知道，她們是特指建築工地的短期工作。

公民身份。這樣的刻板印象和沙巴在短短數十年間，其人口暴增有著密切的聯係。盡管如此，在我所身處的田野中，還是經常能夠踫到無證件、無身份的移民/工。在地人認爲，即使他們不是真正合法的公民，這些移民/工總是「有辦法」獲得僞造的身份證[3]。不過，每每我問起她們是哪裏人的時候，儘管她們已經在這裡落腳、生活，她們仍然以父母親的出生地、國籍作爲準則，說自己從「菲律賓」來，卻鮮少會以自己居住已久的州或地名，像沙巴、山打根作爲説明身份的參照。

木屋區的印尼移民

我所接觸到的這個難民村，按照專門研究馬來西亞的國際遷移的學者 Azizah Kassim 的説法，一共有 2,512 人。説是難民村，其實這個分類不太明確，因爲當中可能還是住著在地人。這也是爲什麼負責幫我引介的州議員特別花了一些時間，到處在其選區的不同村落做調查、登記，希望能夠記下每戶人家的身份。這些村落通常都是早期沿海的木屋區，村民都是自己準備建築材料，就找個空間蓋起房子來。就這樣越蓋越多，大家就聚集在一起。

由於是簡陋的板屋，偶有發生火災，當地政府就以安全、甚或發展之名，將這些木屋區界定為違章屋，並強制村民必須遷移。擁有馬來西亞公民身份的村民，將被分配到政府興建的組屋居住，至於那些並未擁有身份的村民則必須面臨被遣返或驅逐的指令。那位州議員到每個村落作家戶調查，就是爲了確認哪些人是公民哪些不是，以準備做遷移的工作。

我在這個村落裏，跟四戶人家做了訪談，陪同的除了友人和剛自中學畢業的州議員助理外，還有同樣居住在該村落的婦女。這似乎人家都是印尼籍移民，個別家庭的身份和取得身份的過程都非常複雜，我都僅能透過一次式的訪談，及其所能盡量去理解。

訪談的時間是下午兩點多，因有同是村民的婦女在場，反而有助於我們與受訪者之間的交談。有趣的是，出來接受訪談的，都是男性，該家戶的一家之主。儘管。女人是在家或在場的。我所訪談的四戶人家中，有三戶是擁有馬來西亞公民身份的，來馬的時間超過二十年或以上。另外一戶的情況比較複雜，不同家庭成員的身份都有所不同。

其中一戶，是一對年輕夫婦。那三十出頭的丈夫是從小在這裡出生、長大的，因持有馬來西亞公民身份，可以順利進入政府的教育體制就讀，在這裡完成了完整中小學義務教育，後來進入本地技術學院就讀。畢業之後，就一直在一家汽車維修

[3]這樣的印象的確跟我後來吉隆坡的田野經驗相似，但方法可能有很多種。我在吉隆坡、雪蘭莪一帶最常踫到的方法是，這些移工有的是通過合法的管道移入，身上帶有合法的護照和旅遊簽證。待在這裡工作一段時間以後，若打算回家過年、準備到另外一個國家轉換工作或其他種種因素，準備出境時，就會去找相識的中介幫忙核發另一合法護照和有效的旅遊簽證。然後再透過正常的管道，如買機票、車票，經過移民関卡，合法出境。

廠工作到現在爲止。他是 Bugis 族，父母是印尼人，但從未回過印尼，且那裏也沒有他的親人。

另外兩戶同樣擁有的馬來西亞公民身份的家庭，一位是六、七十歲的老先生，最小的小孩還很年幼，因此仍然需要繼續工作，目前在一家工廠擔任警衛員。同是 Bugis 族的他來馬將近三、四十年。另外一戶 Bugis 人家，有兩個男性接受訪問，分別為四十和六十歲左右。六十幾歲的先生，在國家獨立前就已經來馬，更曾參與建國過程。他不僅擁有馬來西亞公民身份，而且還是執政黨之一的巫統(UMNO) 成員，對本地的政治相當熟悉。

這三戶人家的身份較爲穩定，是擁有合法公民身份的印尼移民。我原以爲這座村落的村民都已經獲得公民身份，一直到我踫到第四戶人家，才發現不同的家戶可能還是會有不同的情況。我所踫到的第四戶人家，是一個五十歲、已退休的男性。他在一家傢私廠當廠工，近三十年。近年因爲工傷無法從事勞力工作，只好退休，在家門前擺了個小攤子，販賣一些零嘴、汽水，偶爾炸一些香蕉或製作一些糕餅來售賣。或是將油、糖拆散成小包裝，一小袋才台幣兩元。雖然收入不多，但對於目前失去主要經濟支柱的家庭來說，也算是幫補一些家用。

他和前三戶家庭一樣，同樣是 Bugis 族的印尼移民，本來也擁有合法的公民身份。他的大兒子還因此能夠在馬來西亞接受完整的教育，而且還考上了軍隊，目前已是皇家海軍。但，他說數年前到登記局更新身份時，被當局告知電腦系統並沒有他的資料，因而「降格」為無證件的移民/工。已在另一州當海軍的大兒子，偶爾也有寄家用回來。不過，大兒子還得要照顧妻子和一個小孩，所以自身的經濟條件也很有限。他對於自己的身份遭到改變感到無可奈何，曾經嘗試過了很多方法都不得要領。問起他是否回過印尼探親，他搖搖頭，笑說他跟這裡的鄰居還親過家鄉的親友了，回去又是爲了什麼。同一個家戶，不同的家庭成員卻持有不同的身份，而使到他們擁有不同的遷移經驗。

山打根中型油棕園的印尼有證移工

這次田野能夠走入中型油棕園是意外的收穫。油棕園在研究馬來西亞國際遷移中，是一個重要的產業。馬來西亞政府在不同時期，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方設法管控移民/工的流動；不過農種植業和建築業一直是對移工開放的特例。自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以來，農種植業和建築業面臨「嚴重的缺工」[4]，政府積極引入

[4] 我一直對於「嚴重缺工」這件事情抱著遲疑的態度。在劉梅君的研究中提到，臺灣引入東南亞移工時，是「缺工」與「失業」同時並存的時代，並指出所謂的「缺工」其實是「缺乏廉價的勞工」。我認爲她的研究對於觀察馬來西亞的移工狀況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即「嚴重缺工」或許是一個將當時複雜的政經情況簡化的說法。「缺工」這個理由甚至到現在還是政府引入移工的合理化說辭。對於油棕園的缺工，我後來在吉隆坡的資料室，翻查到 80 年代初、中，英文報章頻密地報

經濟移工，油棕園就是其中一支作爲國家發展的重要經濟農產業。不過，由於大規模的油棕園一般都有企業管制，所有的車子進出都必須向管理處登記，一般外人很難靠近。

在沙巴，大部分油棕園的工作都由印尼移工擔任。根據我在山打根中型油棕園所接觸到的管理層，以及後來在斗湖踫到的小油棕園園主等的說法，他們認爲，相對於其他國籍的移工，雇主認爲印尼移工比較「刻苦耐勞」。一位中型油棕園的管理層透露，他們曾經嘗試引入像菲律賓籍的移工進來油棕園工作，但他們都沒有辦法負荷這裡的工作，覺得這裡很辛苦。「採收棕油果子是一項非常需要技術的工作。很危險，一不小心就會割傷自己。而且油棕園的工作常常是需要在日曬雨淋的情況下，不間斷地工作」，這些管理層都認爲還是印尼移工比較耐操勞[5]。

移工在油棕園裏的生活，對我而言，完全是另一種「景觀」。按照政府的規定，達一定規模的油棕園，其雇主必須為員工提供學校、托兒所、診所、宿舍、宗教場所、休閒場所等基本設施。第一天抵達油棕園時，已經是傍晚五、六點。移工們大部分都已經從油棕園回到自己的家，磚頭製造的家。這跟我們在山打根城市邊緣看到的移工房子，都是亞答葉或板木堆疊而成的房子很不一樣。這些磚屋都是兩棟連成一塊，一排有好十幾戶。一戶家裏就有一個客廳、兩個房間和一個廚房、浴室。

通常，客廳裏的擺設(有沒有電子產品，如電視機、大型收音機)是馬上能夠顯示出這戶人家的財產地位。房子是按照單身或已婚來分配的。他們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同住一戶，平時父母親去工作的時候，孩子就在家裏或是上學或被送去托兒所。他們在各自的家門前都種了許多花花草草[6]，有的還給飼養的家禽搭了些小木屋乘涼。那時候，我們就直接在客廳席地而坐。他們家通常都沒有沙發或椅子，只是用簡單的墊子鋪蓋在地上。進去屋裏訪談以前，大部分移工都在家門外乘涼、聊天、抽煙，因爲還沒到公司提供電流的時間。房子裏即使有電視機或電風扇也還不能使用。我後來問過管理層管控電流的主要原因，他們的說法倒也不是直接說要節省能源，而是擔心移工們看電視看得太晚，不準時睡覺結果導致第二天沒有足夠的精神工作。

導，油棕園裏的印度裔(馬來西亞公民，油棕園、橡膠等工作多由他們來擔任)的工作和生活處境猶如奴隸般困苦。

[5]關於這個部分，我後來跟一個曾在印尼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目前在沙巴的移民/工非政府組織,Tenaganita 服務的印尼女生聊過。她認爲，這應該跟不同國籍、甚或印尼不同地區的人民可能有比較不一樣的特性有關。油棕園管理層偏好印尼移工，尤其是來自印尼鄉村的，可能是相較於來自菲律賓或印尼城市的移工，較爲馴服、容易管理。

[6] 後來聽一些移工說，管理層有辦一些美化家園的比賽，鼓勵大家在家門前種種花草樹木。我後來有問管理層爲什麼會想到要辦這類比賽而不是其他。印尼人很喜歡種花，是管理層對這些移工的認知，所以就順勢舉辦美化家園的活動。

具規模的油棕園均有或應提供基礎的生活設施，所以油棕園的工作往往是印尼移工的首選。我目前所接觸到的油棕園移工，大部分先是用無證件的非正式途徑入境，透過朋友介紹或工頭引介，確認在油棕園工作以後，公司會替他們的身份合法化，代他們到移民廳去繳付人頭稅等費用。這裡的工作有性別之分，男性從事需要大量體力的工作，如採收果子、駕駛卡車、搬運貨物等，而女性則負責撿拾果子、施肥、除草、打掃、保姆等工作。

所有移工每天必須準時六點搭上公司到各處接送的車子，然後到食堂前面集合。六點半會有公司主管召開 Master Call, 移工們必須按照組別排隊，讓Mandol(小工頭)點名、分配工作。之後，就可以在原地找個地方坐下來享用自己或妻子淩晨四點就爬起來準備的早餐便當。待七點多，天開始亮了，才準備坐車小卡車去到今天需要負責的區域工作。一直到下午兩點就能下班，只有少數有能力[7]向公司貸款、買機車或是水牛的移工，才會工作到傍晚五點、天黑以前結束工作。除非他們是負責工廠提煉棕油，才會負責上晚班。

油棕園的面積很大，工作的地點跟住宿有一定的距離。除非移工是按照下午兩點共同下班時間回家，公司才會安排公共交通，否則自己就要自行解決回家的問題。另，一頭水牛的價格要花上馬幣兩千五到四千五不等，依水牛體型、雄雌而定。儘管油棕園的工作是以日薪計算。每天有基本的底薪，依工作類型而定，約馬幣十到十三塊不等。另外，就是以當日的工作量、按件計酬的方式來計算薪資。在這樣的薪金制度下，移工爲了掙更多的錢，就不惜向公司貸款買水牛或機車，才可能將工作時間延長，提高工作量以增加收入。貸款就從每個月的薪資中扣除。

我在這裡踫到的印尼移工合之前在山打根踫到的其他移工很不一樣。他們對於油棕園的工作似乎很滿意。有雇主願意擔保[8]、有基本設施、有穩定的工作、孩子可以在這裡生活、接受教育，到了入讀中學年齡時，若有能力可送孩子回到印尼的學校，或到了工作年齡可以繼續在這裡工作。有趣的是，當我每每問起他們以後有什麼打算，他們都給了跟之前在其他地方碰過的移工很不一樣的答案。

之前在其他地方踫到的移工，不管是在餐廳當廚師的合法印尼移工，或是在洗衣工廠工作、來馬數十年的女工、又或那位由合法公民降格為非法移民的五十歲退休傢私廠工，他們都很努力地想盡辦法要留下來，不僅僅是爲了獲得合法的工作身份而已，而是合法的居留身份。儘管他們在這裡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是那麼的艱辛及高度不穩定。同樣的問題問起中型油棕園的員工，卻有著很不一樣的想法。對他們

[7] 所謂有能力是指那些平時工作記錄和行爲表現良好、有信用、有其他移工(通常是有親屬關係)願意做擔保人，並且能夠得到小工頭認同的移工。

[8] 有雇主擔保，意即雇主願意替移工每年向政府繳付高達馬幣一千二百到八百不等的人頭稅。之前政府雖然曾規定人頭稅必須由雇主來繳付，但政府監督不力，有很多雇主通常都是從員工的每月工資中扣除。所以，有很多無證件移工即使在馬來西亞工作多年，但身份依然不合法，難求願意繳付昂貴人頭稅的雇主。在地雇主通暢給予的理由是，擔心他們付了人頭稅，移工工作沒多久卻逃跑而導致公司的損失。另，也有原來是合法的移工踫到雇主第二年不願意繼續繳付人頭稅而變成不合法的移工。

而言，這個工作和生活穩定的地方，只是暫時性的，雖然回去的日期難以預期。他們總是說，等存夠了錢再回去。至於是什麼時候，他們也無法確定。但是，他們都很肯定地說，有一天還是要回去的。在中型油棕園裏踫到的印尼合法經濟移工，跟我後來在吉隆坡、雪蘭莪踫到的印尼無證件移工，對於日後打算的想法，是高度相似的。

斗湖的「芭」[9]

我後來在斗湖較小規模的油棕園，踫到的兩個園主都是華裔，他們各別的油棕園都由一到兩位移工負責打理。雇主會提供板屋住宿給他們，就建在「芭」裏。他們的工作地點和家，都離城市很遠，需要交通才能出入。但，周末休息或平日下班之後，還是會有在其他「芭」工作的移工會到他們的家拜訪、聊天。我踫到兩個小型油棕園的移工，分別是一對非常年輕、三十出頭的夫妻，另外一戶是來了沙巴工作數十年的老先生。

那對年輕的夫妻，就負責打理整個油棕園。根據他們的說法，每日的工作其實還算輕鬆、簡單的，工作時間和先前在中型油棕園的相去不遠，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為准。他們生了一個三、四歲的小孩，目前就交托在印尼的母親照顧。因交通費昂貴，約兩、三年才回去一趟。他們通常都是穆斯林新年才回去，一回就是兩個月。周末假日時也很少到城市去。

另外一位老先生，約六、七十歲，在這裡工作已經三十多年。他多年來一直都為同一個雇主工作，雇主從公公輩一直到現在輪到孫子來接手。跟她年齡相近的太太，也跟他同住在油棕園裏的高腳木屋裏。我們抵達油棕園時，他們女兒的三、四個小孩都堆在房子裏玩耍。他們好幾個孩子都在這裡長大，都分別到不同地方工作去了。今天因爲不需要工作，所以過來老先生、老太太家坐坐。當時老太太正在木屋露台，利用手動縫紉機縫製廣告布條。她正準備在路邊擺個飲食攤子，賣一些家鄉的食物。

這兩個油棕園所踫到移工，感覺自己很幸運能夠遇到很好的雇主，有穩定的工作。問起年輕的夫妻，答案類似於大型油棕園裏的移工，因爲家鄉還有一個幼小的孩子，以後還要在印尼上學、長大，他們有一天還是要回去的。但是，回程的日期，誰也說不上來。不過，來了近三十年的老先生，儘管已在印尼蓋了房子，由家鄉的一個兒子看管著，還是覺得退休只是一個空想。他已經習慣了這裡的生活，而且認爲錢存得不夠，還得繼續工作。與年輕夫妻相似，每兩、三年就會趁新年回印尼一趟過節。

[9]當地華裔直稱作「芭」，小規模油棕園通常指十到十五左右畝地。

斗湖：日常生活中頻密的界線穿越

在山打根和斗湖中小型油棕園所踫到的移工，都是在邊界來回往返、持續遷移的；這和山打根踫到的菲律賓籍移工和廚師都很不一樣。不過，這樣的頻密遷移經驗都是透過跟移工的訪談中所得知的。一直到了斗湖和仙本娜，才真正見證到國家疆域是如何被頻密地穿越。在吉隆坡和雪蘭莪，你可以經常在公共生活空間，如建築工地、或是小吃店、紗籠美髮、或是假日市中心地區等，都可以看見來自不同國籍、不同身份的移工，而加以想象國家的邊界是多縫隙滲透的(porous border)。但是這樣的經驗和我在東馬看到的截然不同。

與海洋為鄰的斗湖和仙本娜市中心本身是一個海運的重要出入口，不僅為當地人輸入各種各樣的貨源，更是移工們穿越家鄉與接受國的轉接點。以斗湖為例，移民局在碼頭設有関卡，管理各進出馬來西亞和印尼邊境的船隻。移民局關稅部外，除了有小販在那裏販售飲食，還有各船隻公司售票櫃檯，專門往返印尼島嶼 Nunukan, Tarakan 等地的船班，一天約有十三班，從早上 11 點到傍晚 5 點，其中大部分船班都以前往 Nunukan 島嶼爲主。離移民局不遠處，還有一些木製舢板在碼頭岸邊停泊。一群又一群的移工在岸邊的亭子上等候，各自拿著大包小包的，有的是遠行的行李，有的是日常用品像蔬菜、肉品類的。站在亭子的一些移工說，他們過來這裡買日常用品或蔬菜等，反而更方便、便宜。

我發現我在中型油棕園踫到的印尼移工，包括在山打根和斗湖小型油棕園踫到的印尼移工，不管是有證或無證件的，幾乎都提到出入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國邊境的相同途徑。在山打根、拿篤(Lahad Datu)、斗湖一帶的印尼移工，幾乎都是以斗湖作爲進出馬來西亞的重要轉接口。斗湖的地理位置與印尼的小島非常接近，他們都會從斗湖乘船，銜接到印尼的 Nunukan 島嶼，然後再轉乘其它陸路交通工具回到家鄉。

Nunukan 在印尼移工到馬來西亞遷移的過程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接點。它主要是印尼移工進入沙巴的重要關口，一般移工若要前往沙巴各地，都會透過 Nunukan 和 Tawau 這兩個地點的連結移動。此外，一年多前，當 Tawau 還未設立印尼大使館分部時，很多在沙巴工作的移工回到 Nunukan 去更新護照。尤其是馬來西亞政府實施就地合法化時，移工都會到那裏去辦理相關程序。

Michele Ford(2006)的研究指出，印尼的 Nunukan 作爲接收和輸出印尼移工在印尼和馬來西亞往來的中間點，發現大量來自印尼各地的移工迴避正式的申請管道，透過 Nunukan 當地政府和大馬有關單位發出的正式證件而進入馬來西亞國境內。結果，每年數十萬進入大馬境內的移工與出境的人數呈現不對稱的比例，顯示有許多透過非正式管道獲得正式證件的移工仍然停留在國境內。馬來西亞政府每次展開逮捕無證件移工行動，必須在短時間內用船隻載送大量的移工返回印尼時，都會送往印尼的 Nunukan。不過，兩國協調不足導致 Nunukan 在遣送期間面對人潮太擁擠的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

斗湖的田野執行局限

在斗湖進行天也是相對困難的。由於田野時間有限且對當地交通和地理環境不熟，所以向相熟的在地人求助。當我一列出原本擬定的移/難民村落名稱，他們都立即反應，那是「黑區」，被列爲經常發生吸毒、搶劫、打架等事件的地方。當地人從來不會去「那些地方」，「那些地方」是危險的。他們帶我們去該村落時，只讓我們在車上觀看，不鼓勵我們走入村落。按照原本計劃，我們的確是有到 Kg. Ketinggan(當地人稱爲 Ice Box)。不過，就只能用觀察的方式，而無法在那裏跟他們訪談。

我在斗湖的訪談地點，主要集中在市區的攤販或商店，上述提到的小型油棕園，村落路邊的攤販等。此外，因斗湖特殊的地理位置關係，還跟在這裡駐守近兩年、並因經費問題準備結束調查的非政府組織 Tenaganita 聯係，以了解他們在斗湖、仙本娜、拿篤(Lahad Datu)、山打根等地所進行的調查和組織工作。Tenaganita 在沙巴部分的工作主要以宣傳並調查人口販賣的問題爲主，透過跟大學單位和教會組織合作的方式，進行大量的問卷調查，並且協助個案對雇主進行法律訴訟。他們調查的範圍不僅包括移工本身(一共訪問了 375 位)，還跟當地的非政府組織、相關企業雇主和政府單位作問卷調查和訪問。他們提到，在沙巴搜集資料的過程並不順利，尤其是向政府單位索取相關的統計資料，都經常吃到閉門羹。

我在斗湖也有同樣的經驗。我去過移民局、碼頭的關稅部，以學術為名想要索取印尼或各國籍移工出入斗湖的年度統計資料，以及各國籍移民/工所持有的通行證或證件類型。一開始他們都用「官方機密」作爲理由拒絕提供資料，後來我是請當地的國會議員協助我進入該部門辦公室、並讓他們願意閱讀我的公函。碼頭的關稅部後來推說，斗湖只是分部，若需要這些統計資料，必須寄函到沙巴首都哥打啡那峇魯(Kota Kinabalu)的總部詢問(我後來也有寫信過去，但同樣以「官方機密」回拒)。

唯幸在移民局總部能夠索取 2000 年以降、出入斗湖的各國籍移工統計資料。但是，這個成功索取資料的過程同樣必須仰賴當地的一些權力關係，感覺非常粗暴，整個政府的官僚並不鼓勵人們從事研究工作。這後來也在吉隆坡的田野執行過程中屢屢發生。反倒是我到了斗湖新設一年多的印尼大使館，其大使非常願意抽空接受訪談，並且樂意提供援助，唯不方便提供官方統計資料。

4‧2 吉隆坡、雪蘭莪

資料搜集包括官方政策和統計資料、當地相關的碩博士論文、舊報章、由馬來西亞和印尼出版的相關書籍或期刊論文，是此次在西馬執行田野的重要過程，也佔去了我在吉隆坡和雪蘭莪進行田野的大半時間。資料搜尋的方向除了國家圖書館和

各大學圖書館之外，還包括民間的研究資料中心、各相關政府單位(人力資源部、移民廳、內政部、國家統計局、國會) 附設的圖書館。

田野觀察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 Chow Kit。按照原來擬定的田野計劃，本應包括 Kota raya，後來發現該地區已成爲尼泊爾、孟加拉和緬甸這三個國家移工的族裔地景。那裏的商店包括匯款行、餐廳、日常用品店，不管是招牌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或是商品販售的來源都是跟這三個國家有關係。印尼移工聚集的部分主要聚集在 Chow Kit 一帶，聽當地的馬來裔計程車司機說，主要以印尼亞齊族爲主。我之前接觸過一位利用旅遊簽證來馬工作的印尼華裔。她提到，印尼移工一般比較喜歡聚集在 Kampung Baru 一帶。後來才弄清楚，原來 Kampung Baru 和 Chow Kit 非常靠近。

此外，印尼移工訪談的部分主要是利用隨機或滾雪球的方式，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工作類型尋找。目前大部分受訪者都是無證移工，且以女性、從事服務業爲主，主要在 Cheras 一帶。另外，我所接觸到的男性印尼移工主要集中在建築工地，年齡介於 22 到 33 歲之間。在建築工地的訪談中，我也踫到一個來了十九年的緬甸難民。由於資料收集的需要，也有的是因緣巧合，我後來也有機會接觸到中介工會和中介代表，並到各國大使館或辦事處洽詢與官方政策相關的訊息。

舊報章資料收穫

儘管過去一些學者已經處理過舊報章中的跨國遷移新聞，並透過它來整理國家政策的轉變。但是，親身再去翻閱這些舊報章的時候，尤其是看見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間，政府開始積極介入、引進並規制移工遷移；同一時間，本地勞工發起多項罷工行動抗議勞動條件惡劣。

80 年代末，少數族裔的政黨領袖 Sammy Vellu,林吉祥反對引入外籍勞工，尤其是非法。認爲剝奪了機會。也有馬來伊斯蘭教群體反對，發現有基督教印尼勞工有組織性地進入馬來西亞。另，油棕會等開始發出聲音，主張政府不應該大量遣返，而是就地合法化非法勞工，好讓此產業有穩定性的勞工供應。1989 年 1 月期間，"合法化印尼勞工"（尤其是園丘勞工）成爲主要議題。非法女傭合法化問題也成 1991 年期間的重要議題。聘僱非法女傭/勞工的雇主，若不自首將受到嚴懲。伊斯蘭教女傭能不能到非回教徒家庭工作的問題。餐旅業缺工的聲音響起。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發生很多罷工行動，多有園丘工人、公共交通如巴士、廠工、mine workers，其中連續幾天被矚目和報道的是 Hitachi 日立公司裁退員工的新聞。當時的首相馬哈迪和勞工部部長林亞禮成爲資方和國家的代言人，在媒體公開介入罷工行動，代表資方安撫、威嚇員工不要輕易用罷工作爲手段來增加薪資，強調勞方、資方和國家之間的和諧關係。間中一位研究勞工權益的外國學者來馬，發動國際勞工組織向美國政府要求取消大馬的普惠地位，抗議馬來西亞沒有照顧勞

工權益，包括組織工會，而被馬哈迪透過媒體譴責。這段期間資方通常裁退員工的理由是，後者參與非法罷工。

90 年代，工廠釋放訊息缺乏勞工，同時有些工廠的本地勞工和平請願，要求提高薪水。馬哈迪也在媒體上「警告」雇主，包括跨國企業，不要妄顧本地勞工權益，偷偷聘請外地勞工。對於當時發生的罷工行動，馬哈迪也警告本地勞工不要用效仿國外方法，用恐嚇的方式威脅政府。另一方面，政府自 1991 年開始向移工徵收人頭稅，由人力資源部(勞工福利)、財政部(人頭稅)建議，然後再交給內政部決定。

2003-2004 年，馮鎮安當人力資源部部長，一方面說提供勞工服務公司過渡引進外勞，所以政府要管制，如果不管制，國家將過度引進外勞，一直上升到 50 万人。當時外勞佔勞動力人口 30%。但是同時間政府分別向越南、泰國、巴基斯坦、中國等等不同國家簽署備忘錄，準備引進外籍勞工，包括專業技術。但是這段時間，管理外籍勞工有項新措施，要求所有目前已在大馬，包括即將來大馬工作的外籍勞工，必須接受職前訓練。

吉隆坡的無證移工與合法奴工

我在西馬進行訪談和田野觀察期間，剛好就聽到過好幾次移工被逮捕的事情。有一次，正好就在我家對面。那家店屋，樓下白天是一家板麵(類似麵疙瘩)店，在廚房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無證移工，樓上剛好有空房，老闆就把房間當作宿舍給員工住，還有多餘的房間，就租給在附近不同茶餐室工作的移工。淩晨兩點左右，執法單位趁大家都熟睡的時候，就直接闖到樓上把所有無證的移工都逮捕上車，也不需要什麼搜查令。

就這樣，一夜之間，板麵店因不夠人手，整整一個星期沒有開店，附近 B 茶餐室負責沖茶的就馬上換了人頂替，不遠處 C 茶餐室某攤位的老闆娘就得把丈夫或孩子也拉到來店裏來幫忙招呼客人。隔天下午，就聽見隔壁茶餐室的老闆接到訊息，若要有關單位釋放一個無證移工出來，價格大概在馬幣兩千五到三千左右。手邊還有一些積蓄的無證移工就會主動跟老闆建議，自己願意付上大部分的款額，希望老闆能夠幫忙填補一些。否則，就只能等候安排，或直接被遣返回國或等候被判鞭刑。

我後來接觸到一對結義母女，也在那一帶的茶餐室打工。母親幫咖喱麵攤捧餐、洗碗，女兒則幫隔壁豬肉米粉攤子的工作。下午三、四點結束工作以後，又到對面那家茶餐室的攤位幫忙切菜、洗碗，重復一樣的工作。唯有這樣，一天才能掙個四、五十塊馬幣。她們說，最近風聲很緊，除了店屋的那個晚上，執法單位還去了附近的組屋。單是那幾座組屋，就逮捕將近四百人無證移工。那一天，也是淩晨，聽說執法單位連警犬也帶來了，一拉就是好幾車的人。

她們兩母女不住在附近的店屋，而是排屋住宅區裏。她們說，排屋住宅區通常都住了很多在地的華裔，而且有關單位其實不能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貿然闖進屋裏。所以，她們寧可多付一點房租，選擇住在排屋住宅區，正是爲了安全起見。不過，她們發現最近住宅區也不見得安全了。她們那間房子發生了偷竊金鏈案，已嫁給馬來西亞人的印尼裔房東向警方報案，將一位泰國籍移工逮捕。她們說，這位移工向警方透露房子住有無證移工的訊息。結果，警方強行進入房子搜查，她們現在也只能搬離。那好幾個星期，她們就到處跟朋友借地方這裡睡一睡，那裏睡一睡。

面對無證身份的高度不穩定性，她們也很無奈。她們跟我在沙巴中型油棕園踫到的經濟移工非常相似。問起她們是否打算以後都在這裡長久居留，她們都會立刻堅決地反映不會。女兒對完全沒有休假的工作，加上最近的頻密逮捕，開始有一些疲態，正打算明年回去，遲一些再作打算，計劃要去哪裏工作。至於已離婚的單身媽媽，爲了繼續繳付孩子在大學念醫學的學費，還是得在這裡任勞任怨地繼續工作。

無證件工作有很大的風險，不過她們也接受了這是她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這些無證移工之間所形成的非正式網絡，還經常在交換要如何應付執法單位的策略。女兒說，「萬一被逮捕的話，不管你有沒有護照，你就直接說沒有就好了，這樣反而比較安全」。她說，逾期逗留的人比沒有護照的人所需受到的刑法更嚴重。你只要跟執法單位說沒有護照，他們就會將你遣送回國。到時候，你再想辦法過來就是了。

我在另一家茶餐室踫到一個曾經是有證移工的女生。她同時間在幫兩個老闆工作，她一邊負責切、賣水果，一邊就幫隔壁攤子的老闆一起賣糕點。水果攤的老闆也沒有在現場照顧，直接把水果攤子交給她管理，直到下班時間才來收錢。她約 90 年代就來到了馬來西亞半島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靠近新加坡的柔佛州，在一家電子廠當廠工。後來契約結束回去印尼以後，又透過中介替她找到馬來裔家的幫傭工作，也在柔佛州。

那時候來馬當幫傭替人家照顧小孩時，家裏的孩子還很小。每次假期回去探望孩子的時，都把她當作陌生人似的。一直到現在，她跟前雇主仍有保持聯係。她曾照顧的小孩至今每逢節日都會用手機撥電話給她聊天。問起她跟馬來裔或華裔雇主工作的差別時，對她而言，似乎沒有什麼差別。她現在跟叔叔、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在附近住宅區合租了一棟房子。叔叔在菜市場工作，偶爾會去撿些破銅爛鐵拿到回收站變賣。其中一個弟弟就在她工作地點隔壁的電子遊戲機場工作。至於剛來馬猜一、兩年的妹妹，也在她工作的茶餐室裏，負責替客人點送飲料。

儘管每天的工作大概下午兩、三點就會結束，但是她還是會在茶餐室裏坐著，一直等到妹妹四點放工，才一起走路回去。途中，可能順便去買晚餐的菜或日常用品。回家的路程其實很靠近，有時候若她有急事要先回家，一到了下班時間，她還是會騎機車或步行出來，接妹妹一起回家。姐姐說，「她不敢一個人回家啦」。她

們很怕這裡的印度人，曾經路上踫到印度人打搶，搶走了她們身上的現金和飾品。她說，當初用旅遊證件身份進來，是爲了省錢。我問，爲什麼沒有想要到其他國家去工作。她說她喜歡馬來西亞的「aman」(平安)，這裡可以很輕易地找到工作。在印尼即使可以找到相同的工作，薪資卻非常低廉，沒辦法負擔和維持家裏的開支。

她和其他經濟類型的移工一樣，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會停止持續遷移的生活。她/她們總是說「等存夠了錢，就會回去」。另一個曾經在香港工作過的移工，年齡約四十幾歲。因身體不好，結束香港工作回印尼休息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當時，她跟丈夫的婚姻亮起了紅燈。跟丈夫離婚後，她仍然沿用了中介代理的方式來馬尋找工作，後來就在一茶餐室裏工作。儘管她知道有哪些管道可以跳過中介，但是她不想要承擔無證件工作的那種風險，雖然無證件移工的實質薪資往往高出她們的一、兩倍。

相較於之前在香港當幫傭，她抱怨這裡的工作沒有任何休假、喘氣的空間。不像香港，每週都有固定假日可以除外到公共空間休閒。她多次跟現在的雇主反應，都不得要領。雖然這份工作，也經常能夠跟在不同攤子工作的同鄉聚集、邊工作邊聊天。「不過，就是不能去市中心走一走、看一看」，害怕移工逃跑是雇主最常見的理由。

五、成果自評

若針對這次的田野或論文研究，我想最大的不足之處，就是時間太短促，花在跟移工們建立關係、培養信任的時間很少，也不太可能跟他們進行多次或反復訪談。既有的訪談其實對於如何理解遷移主體的認同形構，其實是很有限的。當時在擬定論文大綱和田野計劃執行時，就曾考慮過是否應該將田野地區範圍縮小，且將題目縮小，在政策研究和遷移主體之間擇一。不過，後來還是決定同時去東西馬觀察，並同時檢視政策與移工之間的聯係。

這樣的決定仍然給了我很多意外的收穫。去年十月份，還未去沙巴展開田野之前，我到檳城出席了一項移工的工作坊。那原本是一個僅開放給移工組織工作者參與的工作坊，意外的參與不僅拓展了我對馬來西亞的移民/工非政府組織工作有了更實際的接觸和認識，也讓我意識到既有的研究文獻和舊報章不是理解移工政策的有效途徑。那些經常要處理很多個案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往往是最清楚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巨大落差。

如上述曾提及的，去沙巴進行田野是讓我自己對一直存在的兩個不同的遷移誘因和類型有了更多的警惕。雖然有些訪談很倉促，但是每每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一對一面對面訪談，總是讓我有很深刻地感受，也對國際遷移這個議題、包括這片土地有了更多的自我期許。倘若不是獲得經費補助，這樣的田野恐怕無法走過那麼多地

方，或是在同一地方有能力耗費那麼多時間，尤其馬來西亞的整個官僚體制、公共交通運輸，往往是一個不利於人們生活的環境，更不用說研究。

資料收集的遺憾

馬來西亞政府與各國簽訂的引進外籍勞工的相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可算是檢視官方政策的重要文件，但我一直無法順利在政府單位中取得。即使網上能夠搜尋到某一年與印尼政府簽下的文件，但是，與斗湖踫到的情況一樣，政府單位的官員仍以「官方機密」爲由，不提供資料。

後來，我在某政府單位附設圖書館踫到一位職員，建議我到駐馬的各國大使館或辦事處詢問和索取，或許更方便、迅速。我逐一到印尼、菲律賓、孟加拉、越南、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國大使館和辦事處詢問，通常馬上就能夠得到明確的回復。按照我之前所收集的資料得知，政府一般都會跟各國簽訂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 或 Agreed Minutes，以明訂各來源國移工所限定的工作領域、基本薪資待遇和勞工福利等條件，保障兩國的權益。不過，這和我從大使館或辦事處勞工部的職員所獲得的訊息都有些出入。

除了印尼確實有跟馬來西亞政府簽訂 MOU 之外，其他來源國的職員都說明，他們不曾和馬來西亞政府簽訂國與國之間的合約或文件。他們都透露，他們也非常希望能夠像印尼一樣，能夠與馬來西亞政府共同制定 MOU,至少能夠在國與國的層次上，保障他們國家的勞工權益，減少被剝削的情況。「We still work on it」，是他們對目前處境的答案。

我是花了冗長的時間完成前階段的資料收集，以及訪談，都無法取得 MOU 或類似的文件後，才在田野執行期限快要結束時，決定去各大使館跑一趟碰碰運氣。儘管最終還是沒有從大使館或辦事處取得相關文件，但是那一次的短暫接觸卻讓我醒覺到，或許跟他們這些每天在異地處理自家國民勞工議題訪談，並從他們的工作經驗中追蹤缺乏國與國之間的雙邊約定，會給移工造成什麼樣的困擾，將會是回應我的論文很重要的依據。但，隔幾天就要結束田野回台，以至於這個部分無法進行，也是我這次田野執行中的遺憾。

參考文獻

Azizah Kassim(2000), Indonesian Immigrant Settlements in Peninsular Malaysia,*SOJOURN*,Vol.15, No.1,p.100-22.

Chin, Christine B.N. (2003) Visible Bodies, Invisible Work: State Practices Toward Migrant Women Domestic Workers in Malay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12, No.12. p.49-73

Dannecker, Petra (2005a), Bangladeshi Migrant Workers in Malaysia: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s in a Multhi Ethnic Contex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_____(2005b),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The Case of Bangladeshi Labour Migrants, *Current Sociology*,53:655-74.

Ford, Michele (2006). After Nunukan: The Regul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tion to Malaysia. In A. Kaur and I**.** Metcalfe (eds). *Divided We Move: Mobility, Labour Migration and Border Controls in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228-247.

Hing, Ai Yun*(*2000). Migration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0, pp. 221–245

Hugo, Graeme (2004)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II, Aris Ananta & Evi Nurvidya Arifia(ed.) *International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p.22-70.

Kaur, Amarjit & Ian Metcalfe.(2007),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pecial issue, UNESC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JMS), Vol 9 Issue 2, 2007,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unesco.org/shs/ijms/vol9/issue2)

Pillai, Patrick (1999),The Malaysian State's Response to Migration, *SOJOURN* , vol.14, No.1. p.178-973.

附件：照片

山打根市中心：公共交通的樞紐

山打根市中心：雖然山打根以菲律賓籍移民/工爲主，但在路邊擺賣蔬菜、食品的，通常都是來自印尼的移民/工

山打根市中心：靠近碼頭的市立菜市場

山打根市立菜市場：三樓是飲食攤子，二樓所擺賣的衣飾、日常用品，多是菲律賓籍所開，儼然成爲了另一族裔地景，就像臺北中山北路的萬萬廣場，或是臺北車站附近的小印尼。

山打根市中心：載送移民/工們到附近島嶼的船隻

山打根：正準備被拆遷的 Kampung Muhibbah 村

山打根 Kampung Muhibbah：五十歲退休的家私廠工在家門前外擺賣了一些食品、零嘴，以幫補家用。

山打根 Kampung Muhibbah：村落裏的幼稚園

World Austronesian 世界南島 學術研究計畫辦公室

Gedau 某一中型油棕園：這是移工的宿舍。已婚人士住一戶，單身的兩個同住一戶。宿舍類型會按照移工、工頭、管理層等不同階級而有所不同。

Gedau 某一中型油棕園：這是管理級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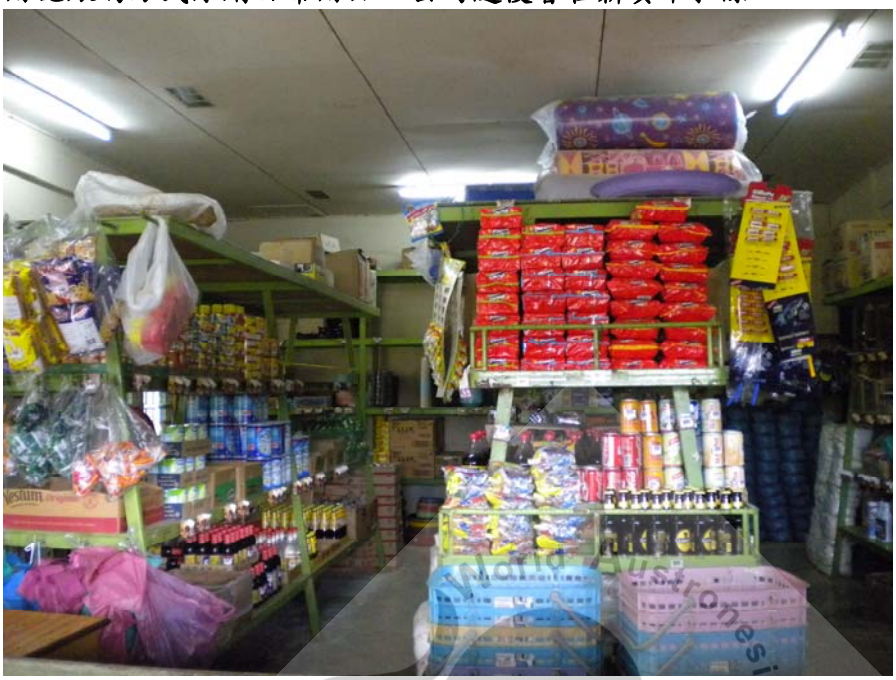
Gedau 某一中型油棕園：棕油公司每年會舉辦美化家園比賽，鼓勵移工在家門前多種一些花草樹木。

Gedau 某一中型油棕園：由非政府組織 Humana Child 協助設立的學校，一共有三個老師，兩個來自印尼，一個來自菲律賓。

Gedau 某一中型油棕園：六個移工負責看護工作，托兒所裏最多會同時間要照顧六十幾個小孩。

Gedau 某一中型油棕園：托兒所

Gedau 某一中型油棕園：便利店，每逢月初發薪資的時候，移工們都可以來這裡用記賬的方式添購日常用品，公司隨後會在薪資中扣除。



Gedau 某一中型油棕園：具有危險性的果子採收工作，水牛是幫助移工提高薪資的重要工具。他們都透過跟公司借貸的方式購買水牛，價格從兩千五到四千不等。

斗湖市中心：從斗湖前往印尼 Nunukan 島嶼的船運公司售票櫃檯

斗湖市中心：從斗湖前往印尼 Nunukan 等地的航班時間表

KONSORTIUM FERI PENUMPANG TAWAU SDN BHD
JADUAL KAPAL

NAMA KAPAL	MASA (BERLEPAS)	MASA (TIBA)	TUJUAN
M.V TAWINDO 1 & 3	11.00 AM (PAGI)		NUNUKAN
M.V LABUAN EXPRESS 2	11.30 AM (PAGI)		NUNUKAN
M.V TAWINDO 2	12.00 AM (PAGI)		TARAKAN
K.M INDOMAYA 3	12.00 AM (PAGI)		TARAKAN
K.M CINTA 2000	03.00 PM (PETANG)		SG. NYAMUK
K.M MEGA 2	03.30 PM (PETANG)		NUNUKAN
K.M MALINDO EXPRESS	03.30 PM (PETANG)		NUNUKAN
K.M MID-EAST 1	04.00 PM (PETANG)		NUNUKAN
K.M PURNAMA EXPRESS	04.00 PM (PETANG)		NUNUKAN
K.M SAMUDERA EXPRESS	04.30 PM (PETANG)		NUNUKAN
M.V LABUAN EXPRESS	04.30 PM (PETANG)		NUNUKAN
K.M NUNUKAN EXPRESS	04.30 PM (PETANG)		NUNUKAN
K.M FRANCIS EXPRESS	05.00 PM (PETANG)		NUNUKAN

19.10.2009 14:45

斗湖的芭：小型油棕園，移工自行搭建的家

斗湖：印尼大使館分佈

斗湖印尼大使館分佈：當時恰好是馬來西亞政府特赦期間，無證移工只要能夠獲得雇主的保證，就能申請就地合法化，大使館外坐滿了等待辦理程序的移工。

斗湖：碼頭，日常生活中頻繁的界限穿越。移工說，來這裡買日常用品還比在印尼來得方便。

仙本娜市中心岸邊：另一界限穿越的景觀，這裡多聚集菲律賓巴瑤族裔的移民

仙本娜：在沙巴菜市場到處都可以看到無國籍小孩，有的拿著雞公車(手推車)幫菜市場的客戶將貨品推送到停車場去，一次馬幣一塊錢。他們被當地教育體制所排斥，無法進入學校就讀。

吉隆坡市中心 Kotaraya: 假日是移工們休閒的聚集地。

吉隆坡市中心 Kotaraya: 這裡已然成爲孟加拉、尼泊爾、緬甸移工的消費休閒地，周圍的商店多是匯款行、通訊行、異國餐廳、日常用品雜貨店等。

吉隆坡 Chow Kit: 印尼爪哇餐廳，Chow Kit 是印尼移民/工的主要聚集點。